

邬向东 主编

二十世纪宁波书壇四鎮

书法论文史料选辑

宁波出版社

J292.28

33

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

20 世纪宁波书坛回顾 ——论文史料选辑

主编 邬向东

宁波出版社

封面题签:集沙孟海字

责任编辑:沈建国

封面设计:沈师白

20世纪宁波书坛回顾

——论文史料选辑——

主编 邬向东

20世纪宁波书坛回顾

——论文史料选辑

主编 邬向东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79号 邮编 315000)

宁波甬江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4.5印张 360千字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02-345-3/J·25

定价:22.00元

20 世纪宁波书坛回顾 ——论文史料选辑

编委会

顾问:徐福宁 邵孝杰 陈继武 盛昌黎

编审:陈振濂 周时奋

主任:孟建耀

副主任:周律之 李立中 董贻安 徐良雄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邬向东 李 军 陈启元 沈元发

金 鼎 洪可尧 贺宇红 贺圣思

赵维扬 徐炯明 龚烈沸 虞浩旭

编辑部

主 编:邬向东

副主编:周律之 龚烈沸(执行)

地域和社会造就的 20 世纪宁波书法

(代序)

周时奋

在 20 世纪宁波的各种艺术门类中,书法是最具有特点和成就的艺术。这一评价,不仅仅是从狭义的地域文化的立场出发,我以为在这一文化命题的背后,有一段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和城市心理演变的意味深长的缩影。正如宁波这座城市在南宋时期的倏然崛起,浓缩着中国古代城市运动的典型特点一样。对近代宁波研究的典型意义在于,作为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这种率先“开放”的格局,对以后的城市发展究竟具有何种程度的影响力,而作为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书法艺术,正是这种影响力折射在社会审美心理上的反映。因此对于 20 世纪宁波书法的研究,它的意义就不仅仅限于书法的本身,它应该还有更为深广的学术价值。

“世纪”是一个人为的概念。它只是人们为了认识历史而建立的一个坐标,一种以百年为单位的“纯数字”的时间划分。真实的历史并不按这一划分去完成它的轨迹。但是,20 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近代化”最充分的阶段,因而当我们研究这个世纪宁波书法,并揭示它的社会背景的时候,就自然地更偏向于“近代”性而不是“世纪”性。

回眸 20 世纪的宁波,如果留心观察这座江南小城与书法的某些关系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生成现象很值得去关注。比如为什么这个世纪的前半叶,上海书坛的领衔人物多半是宁波人;比如为

什么宁波的书家几乎都与商人有某些深邃的渊源;又比如为什么宁波的书家中有不少是学者型的书家;再比如为什么绵延千年的民间藏书之风悄然褪色而收藏书画却蔚然成风,等等。在对这些发生于 20 世纪宁波书法界有意思的艺术现象作出研究的同时,也有必要对这座城市这一世纪书法的社会环境作一简单的分析,以便从另一个角度去探寻问题的答案。

二

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到 19 世纪对座城市的发展走向及和书法有着直接关系的几件大事。

其一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根据中英《江宁条约》宁波的对外开埠,这使宁波跻身于“五口通商”的行列。这一事件对宁波不但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在文化上,由于西学东渐而“抢滩登陆”,改变了本地的教学结构,一批教会学堂在把上帝和近代科学带进中国教室的同时,也率先把硬笔书写带进了中国的课堂,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汉字书写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分流,为以毛笔书写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书法艺术在宁波的独立生成,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

其二是清咸丰十一年(1870)宁波的商业和金融资本向上海的大转移。这次资本转移的直接契机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宁波的商业与金融资本为“避战乱”而大量流向上海,其深远的意义却是,宁波商人以“买办业”为前导,在上海滩稳实地站住了脚。这以后,以“乡谊”为主要纽带,大批宁波人相互提携到达上海。对于宁波商人而言,上海成了真正的“商场”,而宁波却变为他们的“后园”;同样,对于宁波的文化人而言,宁波仅仅是他们蒙读的摇篮,而上海却成为他们施展的舞台。由于“乡谊”的作用,文商提携蔚然成风。有意思的是,文人对于商人能力的最起码评价是要有“一手好算盘”,而商人对于文人基本评价却是要有“一手好字”。近代的上海,是一座足以影响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城市,因此,借助上海

使宁波商人和书家对中国的商业与书法产生影响的前提已经成立。

其三是同(治)光(绪)间宁波商业的再度繁荣,加强了与上海的商务联系。由于宁波平原“地狭人广”,务农、投身商业和通过进学而入仕,一直是这里的劳动力的三大出路,从而形成了“农·商·学”并行的家族劳动力结构。这种结构在家族内部形成了农、商、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导致宁波商人的“儒”化和宁波知识分子的“亲商”倾向。事实上,这种倾向还可以上溯到清初,由于明末浙东知识分子强烈的抗清情绪和抗清行为,使清朝在立国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对以宁波为中心的浙东知识分子采取了严厉的控制政策,这就导致宁波的文人在仕途阻塞后,更弦易辙走向商界,这不但使宁波商人的文化质量得到了提高,而且在宁波商人的人格和个性情趣上表现出文商互补的倾向。这就是为什么宁波的商人在事业有成之后,常常比其他地方的商人更多地资助文人、提携文化、兴教办学、附庸艺术的一个原因,地域的文化价值趋向在这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常常可以通过某些个案发现这样的有趣现象,宁波商人在个人人格理想和价值趋向上,就本质而言,他们实际上仍然是文人。宁波巨商的后裔大多并非子承父业,而是往往被培养成为有学问的文化人。

三

本世纪对于传统文化来说,有着深远影响的大事首推科举制度的废除。由此,原先文人环绕着科举的一切“实用”的行为与目标,比如经学研究、策对、诗文训练、书写功夫培养等等,它的有机整体性完全地瓦解了。这种瓦解,使原先“应试”中的有生命力的构成因素从科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了独立的学术和艺术。书法就是这样的一门艺术。宁波本世纪的第一批书家如梅调鼎等人,起先都曾对科举抱有热切的期望。可以这么说,这一时期能表

现和鉴别文人品格与素质的,主要就是诗词、文章和书法。这是文人区别其他人群的“绝技”。对于宁波的大多数文人来说,在科举废除后的出路主要有两条,一是投身新学从事教学,一是投身商界经营买卖。在这两者中,前者往往比较不容易,因为一则由“旧学”转向新学有一个艰苦的适应和自我改造的过程,二则在辛亥革命前后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新派学者在“抢滩”新学中,表现出更强大的优势。这种新派学者对宁波这样开放较早的地区来说,是并不罕见的。传统文人在这一阶段受到了痛苦的锤炼,一些在学术和艺术上有所造就的文人,就选择了第三条路,那就是卖文鬻字。

我在这里想特别说明的是,本世纪初的宁波书法并不全是轻松愉快的创作,书家们往往是为了生机而出卖自己的书写技艺,从而获得生存的可能,并以此保留文人独立的人格。但是,书法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与商业合流了,而且为了有更多的商机,他们只能走向上海这一大市场。这在当时文人的自我意识里,可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对于宁波籍书家的群体发展来说,则绝对是一件好事,他们跳出了原先地域的封闭,从一个小城走向了中国的舞台,走向了有可能获得更大交流和更大作为的舞台。

从宁波走向上海,进而以“上海书家”的面目到全国的各大城市,以至于海外,这以后似乎成为宁波籍书家的一条具有规律性的道路。这在宁波并不奇怪,因为社会百业中有许多行业实际上都走了这么一条路。宁波人称谋业上海为“出门”,而且在社会的价值趋向中,“出门人”显然地比居家而作的人更有志气,“出门”似乎成了青年人追求上进和出息的主要标志;同时,有“出门人”的家庭,其社会地位也显然比一般家庭要高。因而,在芸芸众生趋之若鹜地奔向全国各大城市的时候,夹带了有书法成就和潜质者,这是不足为奇的。这种社会心理态势,造成了宁波书家大量的“墙外开花”现象。确实,本世纪的宁波书家,有成就者大多活跃于外地而

并非本土。对于包括书法家在内的宁波艺术家群体的流动轨迹,并不是单一地外向的,他们往往是来来去去地流动于家乡与客乡之间,这就使宁波本土的书风始终具有一种开放的品格,而且不断地获得广泛的交流。造成这一格局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是对本世纪的宁波来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那就是战争。民国初期这里是“皖系”和“直系”两大政治势力相互消长的地区,加之浙人的独立意识导致的以军事独立来实现“浙人治浙”的理想,因而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恐慌,常常如阴云笼罩在这块土地之上,这是文化人和书家以“外流”为主的时期;北伐战争以后有十年左右相对稳定时期,宁波的经济、文化获得了较为显著的复苏和发展,这一时期培养了本世纪的第三阶段的文化人和书家,如沙孟海、潘天寿,为他们在青年时期的艺术奠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抗日战争的前期,由于宁波处于非战略区的地位反而出现了一段畸形繁荣的日子,以上海的宁波巨商为主体的宁波同乡会,把大批噤若寒蝉的外地同乡纷纷接应回乡,本土文化一时反显繁荣;1940年沦陷前后,则再一次地向上海“复归”,直到解放战争结束,才回到稳定的社会环境。在这种来来往往的艺术人口迁移中,包括书法家在内的艺术家本身饱尝了艰辛,但是艺术的本身却不断地获得交流与融合、撞击与互补。这是宁波本世纪第二代书家所际遇的十分特殊的社会条件和环境。

四

衡量一个地方的文化或艺术的成就,往往不是以“平均海拔”而是以“主峰”的高度,因此,代表人物的文化艺术成就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陈振濂先生在对于本世纪宁波书法及其代表人物研究后,所作出的三个时段的划分。第一阶段,以梅调鼎为代表,其时还有章棫、章銓、沈卫、严修等人,他们是一批带着“遗老”的心态,

而有成就的主要的书法活动则在民国期间的书家；第二阶段书家以冯君木、钱罕为代表，包括陈训正、赵叔孺、高振霄、马衡、叶恭绰等书家，这一代书家的社会背景变化跌宕，新旧观念交替代序，但是对宁波书法的继往开来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阶段的书法家以沙孟海为代表，其间著名的尚有吴泽、朱复戡、秦康祥、张鲁庵、潘天寿、陈训慈等人，他们是本世纪宁波书坛最有影响的书家群体。从这些代表人物所构成的坐标中，我们大致地看到了本世纪宁波书坛的质量与影响力。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建国后宁波本土的书法活动。“建国后”在时间上的概念即是本世纪的后五十年，它基本上又可以划分为“前二十七年”和“后二十三年”两个阶段。

前二十七年对于宁波本土书法来说，是一个重新酝酿和积聚期。在这一时期里，就社会认知而言，书法的独立审美意义基本上被忽视，书法淹没于文字的表意功能中，如果说它的社会意义还没有被彻底地否定，则主要是因为它可以成为表达政治概念的工具。书法与书写、审美与习字已经混淆成一个十分糊涂的概念，更无法涉及书家的个人风格、流派。由于地域的文化传统使然，这一时期的书法意识仍然在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们如周节之、周律之、凌近仁、丁乙卯、张星亮等中间顽强地保留着，主要地表现为这些有识之士执着地将书法视作一门艺术，着重于保存传统，使之绵延继承，并缓慢地积聚和发展着。有意思的是，在“文革”的后期，一些懈怠于极左政治的“逍遥派”群众，开始注意到书法活动对于精神生活的积极意义，并可以以此作为消磨时日的一种方法，于是，研磨书法的兴趣在一定的范围内暗然滋长，“纯艺术”和“纯审美”的趣味悄然萌生。这一现象实际上暗示着一个新的过渡时期的诞生，它不但具有积极的承启意义，而且为“文革”结束后书法艺术的迅速复兴开始了它的奠基。

当中国结束“文革”后，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很快被

社会所认同和重视。在宁波,首先是民间自发学习书法热情的高涨,随之出现了遍地开花的业余书法教学班和中小学作为“第二课堂”的书法兴趣小组,以教学面目出现的书法活动,不啻是培养后来者,教师本身就成为书法艺术的直接实践者和传播者。宁波的这些热烈的书法活动,除了传统的文化精神在内中所起的作用之外,还有一个几乎带有共性的原因是,宁波后学对于作为宁波籍的书法大家沙孟海的追慕,他们因此引以为楷模和光荣。这里,除了沙孟海的书法成就外,还有他的人格因素,而沙孟海本人也一直以作为宁波人而感到自豪,并与故乡始终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宁波的地方官员和有成就的企业家中也不乏对书法持有热情者,这在无形中似乎表明了“上流社会”对于书法艺术的价值趋向,并在一定的范围内衍变为一种社会“时尚”。这时候,有一个新的契机给宁波的书家以更大的艺术自信心,那就是宁波成为国家的“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这在包括书家在内的市民公众的心目中产生了跟随城市一起“升格”的自豪感,并自觉到有一种对于中国应有更大作为和影响的责任感。一个最直观的事实是,宁波的书法界独立地成立了“书法家协会”,而在此之前,都是书家以个人身份加入省协会的行列。这种自豪感所产生的直接效果是鼓舞了宁波书法家的艺术胆魄和艺术想象的自信心,尤其推动了青年书家对艺术品格的更高追求,以及艺术风格的个性化和多样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年来,宁波青年书法家的群体已经形成,作为本世纪第五代书家在全国开始产生影响。

值得提出的是本世纪宁波书家对于中国书法理论的贡献。理论的成熟是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书法从近代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从50年代起,沙孟海就致力于书法理论的研究,并把书法作为一门真正的艺术学科在浙江美术学院开设了专业系科。这以后宁波籍的青年书家陈振濂教授,秉承了导师沙孟海的指导思想,拓展了书法理论的研究领域,从书法史、书法技法、书法审美、

书法教学、书法交流比较,直到整个书法学理论的建立,在中国的书法史上第一次构建了一个庞大而完整的书法理论体系。陈振濂似乎是又一个标志,他的地域文化意义就在于,他不但标志着青年一代的宁波书家在浓郁的故土书学传统的激荡砥励下,所作出的一次重大的质变和升华,而且还在于他以丰厚的学术成果,完成了本世纪中国书法从近代技法传统走向现代理论自觉的历史使命。只有在这个时候,宁波人才意识到已经有资格可以说出一个久藏心间的感觉:这个使命似乎本来就应该由宁波书家来完成。

五

跌宕起伏的这一世纪已经接近了它辉煌的尾声。宁波的文化界在考虑以何种方式和载体来庆祝世纪之交到来的时候,自然想到了可以在本世纪引以为骄傲的书法艺术,决定用一次“宁波书坛百年回眸”的活动,让这座城市在浓郁的书馥墨香中完成世纪的交接。这个活动包括众多的回顾展览和一次认真的理论研讨,并且出版一本有理论分量和学术价值的纪念文集。这一活动由宁波市文化局和宁波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袂发起,并由天一阁博物馆、宁波市书法家协会和沙孟海书学院共同承办。这绝对是一件富有积极意义的好事。这本文集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已经出版,在奉献给读者的时候,我们衷心希望不违初衷。

1999. 10. 24. 于听雨斋

目 录

地域和社会造就的 20 世纪宁波书法(代序)	周时奋(1)
20 世纪宁波书法史研究	陈振濂(1)
宁波书坛百年回眸	周律之(20)
天一阁藏法书概述	徐良雄(30)
翰墨传人 群星灿烂	
——宁波书法教育历史与现状	陈启元 任奕山(34)
20 世纪宁波印人录	周节之(43)
浙东书河一瓢记	龚烈沸(60)
宁波人与西泠印社	周律之(63)
近现代甬上篆刻名家析评	俞建伟 蒋 华(65)
郝翁小传	叶伯允(79)
《郝翁集锦》序	冯君木(81)
梅调鼎作品集稀如星凤	洪丕谟(82)
梅开岭上 香飘千里	
——梅调鼎及其书法艺术	郑学溥(86)
浙东书风的开创者——梅调鼎	虞浩旭(91)
“宁波帮”开山鼻祖严信厚的书法艺术	岳洲 童心(93)
严筱舫的行书对联	童衍方(94)

- 甬上杏林书家 履之 人和(96)
- 冯君木先生行状 沙孟海(98)
- 冯君木冯都良父子遗事 沙孟海(100)
- 冯君木和他的书法弟子 周 乐(112)
- 近代宁波书画篆刻家赵叔孺 张念祖(114)
- 一老巍然起东浙 书画金石蔚三绝
——记赵叔孺先生 潘德熙(119)
- 近代印坛巨擘
——赵时桐先生篆刻艺术管窥 周节之(122)
- 赵叔孺对近现代印坛的影响 张奕辰(129)
- 叶恭绰的书法艺术 虞浩旭(136)
- 马衡 马国权(141)
- 《凡将斋金石丛稿》序 郭沫若(144)
- 学识渊博 成就卓越
——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 余 正(145)
- 马氏家族 名流盈门
——马衡兄弟及其后辈 陆 云(147)
- 浙东三书家——任堇、钱罕和吴泽 沙孟海(171)
- 题吴公阜临倪雲林法书 周采泉(175)
- 《芥飞馆印留》序 沙孟海(177)
- 杨霁园《张迁碑》考略 郑学博(178)
- 钱罕碑刻书法考评 沈元魁 沈元发(184)
- 承上启下的钱罕和浙东风 郝 墟(193)
- 潘天寿的书法 沙孟海(196)
- 潘天寿书法篆刻论 陈振濂(199)
- 试论潘天寿书法艺术的风格 楼明月(232)
- 沙孟海翰墨生涯序 启 功(239)
- 沙孟海翰墨生涯序 陈训慈(241)

- 沙孟海研究····· 陈振濂(243)
- 沙孟海先生艺事记略····· 祝遂之(260)
- 我和沙孟海先生半个世纪的交往····· 毛翼虎(263)
- 沙孟海先生早年留甬印痕····· 周节之(266)
- 沙孟海先生早年书法寻踪····· 周律之(269)
- 真挚的情 醇厚的意
——追忆沙老二三事····· 李立中(276)
- 谁人不知沙孟海····· 陈修良(278)
- 吴昌硕先生与沙孟海在 1925 年····· 沙茂沙(287)
- 神游三代 冥心造化
——记朱复戡先生····· 瓶 研(294)
- 有金石遗音
——试论朱复戡先生的书法艺术····· 计文洲(298)
- 印谱收藏家张鲁庵····· 郑逸梅(303)
- 追念张鲁庵先生····· 周节之(305)
- 秦康祥····· 马国权(311)
- 匆匆东海客 来去亦潇洒
——包六科先生及其书法艺术····· 曹国庆(313)
- 书画家凌近仁····· 沈元魁(323)
- 郑逸梅笔下的宁波书家印人····· 郑逸梅(325)
- 师竹斋杂记四则····· 周 柯(327)
- 谦恭有晚生 宝刀铸清峻
——《式熊印稿》序····· 韩天衡(329)
- 高式熊先生····· 陈浩星(331)
- 浓浓乡情如醇酒
——访著名篆刻家高式熊····· 童心 岳洲(333)
- 浙东书风一脉——张星亮先生的书与人····· 周律之(335)
- 书艺播种人

——忆乙卯老师·····	洪民生(338)
丁乙卯和他的书法艺术·····	李兴祥(340)
《郑玉浦书影》序·····	桑文磁(342)
《周节之印存》序·····	马承源(343)
一位金石家的晚年·····	
——周节之篆刻 50 年小记·····	王永嘉(345)
周节之先生其人其艺·····	贺圣思(347)
《中国书画篆刻通典》序·····	沙孟海(350)
《书法美学通论》卷首语·····	沈 鹏(353)
《日本书法通鉴》序二·····	(日本)杉村邦彦(358)
理论之树常青·····	
——谈“陈振濂旋风”·····	梁 扬(363)
轻松自如 汨汨而出·····	
——陈振濂书画篆刻作品展览观后感·····	李立中(370)
序记三则·····	周律之(373)
正在崛起的宁波中青年书法群体·····	吕益军(376)
为此宽衣带 足知情独钟·····	白 冉(381)
附录:·····	
1. 20 世纪宁波书坛大事记略·····	(385)
2. 宁波百年印学年表·····	王惠定(401)
编后记·····	(444)

20 世纪宁波书法史研究

陈振濂

处于近现代中国书法史中^①的浙江书法史、宁波书法史,本来只是作为一种地域书法史现象而存在的。事实上,我们看近现代宁波书法史,也正是取这种视角而为之。^②但反过来,也正是专事研究近现代中国书法史、甚至研究近现代跨国的中日、中韩书法史的经历,才使我们得以从一个文化的层面上对近现代宁波书法史进行新的观照,从而发掘出它的并非仅限于地域,而是与整个书法史进程脉息相通、休戚与共的诸多历史特点与时代特点;并进而论定:在近现代宁波书法史的追溯中,我们已可发现一些在浙江的书法史、或浙江其他地区书法史中尚未发现的新内容。如果仅仅限于地域研究而不施以一个整体的历史文化观照,则作为地域的宁波未必一定有多少历史价值——正如作为地域的书法,在全国可以数以千百万计,但大多数的地域是未必具有书法史价值而只能限于行政区划一样。但在宁波,我们却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新的学术发现、发掘、发展的可能性。

讨论宁波近现代书法史,应该先对宁波这一地域的历史文化特点先作一特殊的定位——唐称明州、宋称庆元、明代开始设立宁波府,在民国以前的宁波,是以“鄞”(今鄞县)为中心的一个地域指称。随着 1949 年宁波改制称市,鄞县反而成了市辖之县治。^③但